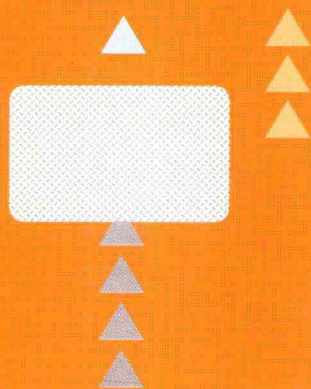


政治与社会译丛



# 绕过民主

## 当代中国私营企业主的身份与策略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人民出版社

Capitalism Without Democracy  
The Private Sector in Contemporary China

[美] 蔡欣怡 著  
黄涛 何大明 译

在企业家们寻求相互作用——他们本是相互之间以及都与地方官员之间——的过程中，他们正在以反映其需求和利益的种种方式，改变着国家的官方政治制度。虽然自由的民主国家允许多种多样的政治表达形式，而中国企业家目前还在等待，在传统的政策会议上要比投票、游说和平威权谈判策略也可能更有效。于是，在本书中，我关注受监督的问题，例如在中国做私营企业家意味着什么，企业家如何实际去摆脱自身，而且更根本的是，他们如何考虑事情。我们将看到企业主们正承受成千上万种来自国家及国家制度的限制，而且在此过程中，他们正怎样从根本上改变了官方的政治面貌。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丛书



# 烧过民主

现代中国从民主主义的自杀与复活

作者：陈独秀  
译者：陈独秀

原书名称：The Future of Democracy in China  
译者：陈独秀

原书名称：The Future of Democracy in China  
译者：陈独秀

本书是陈独秀在1918年发表的《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一文，探讨了民主主义在中国的命运。文章指出，民主主义在中国已经“烧过”，即被烧毁，但作者认为，民主主义在中国仍有其生命力，并可能在未来复活。文章还讨论了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关系，以及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

# 绕过民主

当代中国私营企业主的身份与策略

Capitalism Without Democracy: The Private Sector in Contemporary China

[美] 蔡欣怡 著

Kellee S. Tsai

黄涛 何大明 译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人民出版社

*Capitalism without Democracy: The Private Sector in Contemporary China*, by  
Kellee S. Tsai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Copyright © 2007 by Cornell University

This edition is a translation authorized by the original publisher, via Bardón-  
Chinese Media Agency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绕过民主:当代中国私营企业主的身份与策略 / (美) 蔡欣怡著; 黄涛, 何大明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3.1  
(政治与社会译丛. 第3辑)

书名原文: Capitalism Without Democracy: The Private Sector  
in Contemporary China

ISBN 978-7-213-05245-3

I. ①绕… II. ①蔡… ②黄… ③何… III. ①私营企业-经济政策-  
研究-中国 IV. ①F279.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81548 号

浙江省版权局  
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 11-2010-15 号

## 绕过民主:当代中国私营企业主的身份与策略

作 者: [美] 蔡欣怡 著 黄涛 何大明 译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

市场部电话: (0571) 85061682 85176516

集团网址: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http://www.zjcb.com>

电脑制版: 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6.25

字 数: 24.3 万

插 页: 2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3-05245-3

定 价: 3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 政治与社会译丛编辑委员会

第三辑主编 郑永年

编委会成员 朱光磊 张小劲 张 静 林尚立  
郁建兴 周光辉 周晓红 郑永年  
黄 平 景跃进 刘亚伟

## 出版者言

出版本辑“政治与社会译丛”是基于我们对出版职责和中国现实的思考。出版者承担着推动知识的引介、传播以及思想和文化的创新之职能，自然地，面对生活，我们应该永远在场，永远开放，永远创造。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大的转型与变迁，她过去经历了什么，她正在面对什么，她将走向哪里，这是每一个关心、热爱中国的人都应思考的。事实上，这不仅吸引了国内学者的强烈关注，也随着全球化和中国国际影响的扩大而吸引了世界各地学者的目光，海外当代中国研究正呈日渐繁荣之势，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跨学科研究领域，也涌现了许多站在客观的立场上潜心研究并撰写出来的具有影响力的著作。我们引进并出版这些著作，是因为我们相信，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崛起中的中国唯有进一步打开视界，才能更清晰地认识自身，并在和其他文明的碰撞和交流中，重塑包括学术在内的自身文化的品格。

本辑译丛所选书目是经编委会和出版者反复商讨、比较后确定的。这些著作研究立场客观，议题重大，视角新颖，体现了众位学者敏锐的学术眼光和对中国问题的准确把握，相信读者会从中获益匪浅。当然，由于作者的西方文化背景和思维定势，局限与偏见难以避免，读者很可能与我们一样对某些观点难以认同；同时，中国社会变化急速而深刻，相关著作中涉及的特定历史时期的某些问题以及作者由此得出的论断，也许已经或正在由改革所解决和修正。以上两点，读者诸君不可不察。

上述文字，算是出版者的不算多余的“多余的话”。

## 译丛第三辑序

译丛第一辑序曾指出,译丛的总体目标是: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寻找和确立一个反思自身现代性的“他者”,在了解“他者”的过程中,认清和确立自身。那么,更进一步,通过认识他者眼中的“我”来认清自身,是不是一条更便捷的路径呢?在确定译丛第二辑书目之时,编委就这样把目光转向了海外当代中国研究。

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海外当代中国研究呈现日益繁荣的趋势。诸多因素促成了这种繁荣。随着中国内部的发展和外部影响力的增加,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社会的有机分子。任何国家或国际组织在制定对外政策时,都已不能忽视中国因素,都需要深入研究中国的对外政策和作为对外政策基础的中国内部政治、经济现状。了解中国的需求使得西方各国对中国研究进行大量的资助。从学术进步来说,中国的转型已经为海外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巨大无比的实验室。百年来特别是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变迁为他们提供了极具吸引力的素材。欧洲的转型产生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大多数社会科学家和思想家,包括马克思、韦伯和杜尔凯姆。中国的大转型可说是一个迥异于西方世界的绝好实验室,提炼自西方现代化过程的很多理论框架和范畴都可在此接受检验,或被证伪,或得到拓展充实。任何一项社会科学理论如果不能有效解释中国转型现象,那么其说服力就成为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对中国研究的学术兴趣已经越出中国问题专家这一群体,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研究者也开始把眼光转向中国。在研究群体中,最值得指出的是,游学海外的具有中国背景的学者成长得很快,并且已经成为当代

西方中国研究的不可分割的部分。他们的研究往往是他们在西方接受的社会科学训练和他们的中国经验的对话结果。这种对话是海外学者本身所不具备的。正因为如此，他们的研究正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西方的中国研究。中国研究方法论方面的变化也同样重要。传统的汉学基本上把中国视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汉学在传播中国文化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但基本上没有把中国研究整合到社会科学研究中。与传统汉学不同，海外当代中国研究大都基于社会科学，在研究中国的同时努力把中国研究整合到一般社会科学中去。社会科学和中国研究的整合正把海外的中国研究推到一个新的阶段。在所有这些因素驱使下，不断有优秀著作和论文问世。

返回到国内，随着改革进程的推进，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复杂性激增，诸种论争近年来愈渐尖锐，改革似乎到了“行路难，多歧路”的困难阶段。改革之初，我们或许可以摸着石头过河，但改革行进到今天，不对过去的历史和当下所面临的复杂现实进行客观而理性的认识，那显然会迷失未来的方向。人的理性固然非常有限，而人类的发展也极少遵照人的理性前进。然而，反思过去，尽可能地理解历史，发现人类行为和社会制度中可能存在的某些模式或规律，使社会尽可能地朝着我们加以认同的方向走去，正是社会科学家该承担的责任和使命。此种背景下，引进海外当代中国研究的优秀成果无疑是一件急需做的有价值的事情。任何社会的发展不可能孤立进行，在全球化时代尤其如此。既然中国已经是全球社会的一部分，那么中国的内部发展必然要关切外部世界的境况。西方中国研究往往采取比较的视角，就是把中国置于国际的环境中。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些研究对中国自身的发展取向具有参考价值。就学术进步来说，海外当代中国研究是中国当代社会科学领域中真正具有国际学术对话空间的研究领域。随着中国的崛起，各方面也在热议如何争取中国的国际话语权问题。但所谓的国际话语权就是说，中国的学术不能自说自话，如果海外不接受中国的话语，那么就很难在国际话语中占据一席之地。也就是说，中国的话语权必须是在和海外的互相交流和互相辩驳中发生和发展的。而引进海外的中国研究作品当是最有效率的一个途径。

我们也相信，本土研究和域外学术是长短互见的。国内学者作为历史的亲历者，有着无可匹敌的现场面对研究对象的优势和资料获取上的便利，



能切身感受变化的细节和活生生的意义;但另一方面,亲历者的地位也可能导致研究者被自身情感所左右,为利益所羁绊,为其所处时代的“迷雾”所蒙蔽,以至于不能跳出一时一地的障碍,发现问题并理性地把握事物的客观性。反过来,域外学者作为历史的旁观者,容易持比较中立、客观的态度来对待研究对象;更重要的是,受西方深厚的学术传统的熏陶,他们崇尚科学的认知模式,重视经验、崇尚分析、善于系统化,其分析方式、审视的角度和力度往往是国内学者所缺失的。但同样,由于文化和历史的隔膜,他们也可能无法完全理解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的经验和境遇;他们在分析时所持的预设和得出的结论也可能不适用于特定的中国社会。不过从学术进步的视角来说,学术范式的产生、发展和变化的动力源自于不同范式间的交流和冲突。本土学术范式的进步需要海外学术范式,正如海外学术范式的进步也离不开本土范式一样。

所以,我们一方面期待在此译介的著作能开阔国内读者的视界,增加读者对中国现实问题的认识,另一方面又希望我们的读者能随时用批判性的眼光来审视这些著作,在审视和追问中超越西方理论框架,真正逼近中国的经验事实,并在此基础上催生和提升本土化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建立真正有活力的中国现代学术乃至社会科学。当然,要达到这个目标可谓任重道远,需要学术界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

## 序 言

ix

当我 1992 年第一次访问中国时,我记得自己大吃一惊,在这个威权主义国家里,基层的人们似乎可以做了很多违规之事而安然无恙。诚然,若是涉及那些会威胁党一国合法性的做法时,对言论自由、结社集会自由等还是有着严厉的限制的,即使现在依然如此。但是,围绕着中层的那些过时的或不实用的规章制度,普通老百姓正在设法钻空子。几年后,当我对非正式金融开展研究时,中国私营企业家的逃避偷漏能力进一步给我以很深的印象。尽管障碍重重,但中国的企业主们还是通过创新的和经常是非法的手段筹措到资本,而且在此过程中使私营经济蓬勃兴旺。

私营企业家的改造潜力仅限于经济问题吗?私营经济发展在中国的政治含义是什么?本书给出的结论是:迄今为止,市场的扩展并没有给中国带来民主,而且我的研究表明,私营企业家不太可能要求政权变革。北京一位从事风险投资的资本家预测,“如果中国变成民主国家,天下就会大乱。我最关心的,是保持社会安定,这样经济就会继续繁荣。”但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不管中国最终是否会向民主转型,国家最高政治制度的剧烈变化已经发生。而且,这些变化有利于私营企业家——中共现在欢迎资本家入党,而且至少在纸面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保护私有产权。在缺乏政权转型或由私营企业家所发起的政治动员的情况下,这些制度变化是怎样发生的? x

我的解释在逻辑上与我在遮遮掩掩却又广泛存在的非正式金融世界里所发现的相同:私营企业家在各自与地方官员的单独合作中,已经发明了许多我称为“适应性非正式制度”的东西,它们是对付各种正式制度的限制与

机会的常规化的适应物。进而，这些适应性非正式制度已经破坏了曾尽力去限制企业主行动的国家正式制度，并有助于国家正式制度的改造。私营企业家对中国政治确实有影响，但这种影响是通过间接的手段产生的。在威权主义体制下，这一点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内生性制度变化。正如一位中年旅馆老板所说，“在我的一生中，我已经经历过两次革命——‘文化大革命’和市场革命——而且不知怎么的，中国已经设法活过了这两次革命。”

由于本书探索适应性非正式制度的起源和后果，理所当然，对此研究项目的许多贡献是通过非正式手段产生的。这些非正式手段五花八门：深夜发来的冲动的电子邮件、快乐时刻一本正经的作秀、出租车司机的闲聊、没完没了的宴席、阴暗潮湿的按摩营业厅、在公交中心的耽搁，甚至在我那位于麦金撒勒大楼办公室外喷泉边的交往。回首这些遭遇使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和象牙塔中的生活多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色彩虽不那么绚丽，但对解决社会科学学术界所面临的实际挑战来说更为核心的东西，是我所能写下的另外一些像书本那么长的谢意，以感激多年来花费时间支持此项工程的各个方面的朋友、同事、机构、受访者和学生。

首先，没有多种来源的机构对我的支持，此书不可能问世。由项目经理苏珊·帕瑞丝(Susan Parris)所管理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国际研究资助项目(NSF INT-0107326)长达两年的资助，使我得以设计和实施了一个基于多阶段区域概率抽样的全国性普查，以及在中国各地对成百上千企业家及官员进行的田野采访。本书中所表达的任何意见、调查结果、结论或建议均由作者本人负责，并不一定反映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观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民营经济研究中心和社会学研究所确实不愧为专业的东道主。在此方面，我感谢张厚义和陈广金作为研究合作者的勤奋和耐心。我还感谢戴建中、黄平和王小艺自始至终的友谊和帮助。

我所在的学术机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学系慷慨地惠允我把国家基金分作五年来用，这意味着我能够进行田野工作、分析数据、生育两个孩子，并且撰写此书。而学生和同事们照应着我不在校园的时光。

贤明的出版机构惠允我使用原在我的论文《不成一个阶级的资本家：中国私营企业家的政治多样性》(《比较政治研究》第39期，2005年11月：第1130—1158页)中的一些材料。

我还感激“东亚政治晴雨表项目”(2000—2004)让我从中获取了数据。该项目由胡佛教授和朱云汉教授共同主持,主要资助来自台湾“教育部”、“中央研究院”和台湾大学。

我感谢玛丽·阿库林(Mary Akchurin)、陈雪莉(Shirley Chen)、丹尼尔·斯雷特(Daniel Slater)和杰克·咏(Jack Yeung)极佳的研究帮助。李建军、王娟和曾锦及时地为我澄清了许多疑问。我主持的比较民主化研讨班的研究生们 Renny Babiarz、Michael Becher、Kersten Hoenig、Michael McCarthy、Mariam Mufti 和 Jeff Pugh 批评性地阅读了本书手稿中的关键章节,我由衷地感谢他们。还要感谢 Mariam Mufti 在编制索引上慷慨地给予援手。

在规划制作和完成此书的过程中,我还极大地受惠于 Howard Aldrich、Joel Andreas、Giovanni Arrighi、Richard Baum、Eva Bellin、Thomas Berger、白思鼎(Thomas Bernstein)、Kathy Chen、陈勇军、Erin Chung、William Connolly、Sarah Cook、Richard Doner、Mary Gallagher、Merle Goldman、Stephan Haggard、郝灵欣(Lingxin Hao)、Jonathan Hartlyn、何大明、黄亚生、Richard Katz、Margaret Keck、Scott Kennedy、Melvin Kohn、李成(Cheng Li)、Davin Mackenzie、Gerald McDermott、Tobie Meyer-Fong、Ethan Michelson、梅健华(Kin Moy)、黎安友(Andrew Nathan)、戴慕珍(Jean Oi)、白威廉(William Parish)、Albert Park、裴松梅(Margaret Pearson)、裴敏欣、裴宜理(Elizabeth Perry)、Benjamin Read、Elizabeth Remick、William Rowe、Ben Ross Schneider、Adam Sheingate、史天健、Matthew Shum、Beverly Silver、Aseema Sinha、Daniel Slater、Sidney Tarrow、Lily Tsai、魏昂德(Adrew Walder)、Andrew Watson、Martin Whyte、傅高义(Ezra Vogel)、杨大利、Madeleine Zelin 和 Elke Zuern 诸位睿智的建议、有创见的评论、锐利的问题和卓有成效的交流。

我还从美国政治学会和亚洲研究学会的年会出席者那里获益良多,此外还受益于下列机构举办的研讨班和会议(有些单位还不止一次地举办):哥伦比亚大学、康乃尔大学、乔治城大学、哈佛大学、印第安纳大学(布鲁明顿)、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江汉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卢思基金会、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哈瓦那大学、北卡州立大学(教堂山)、密歇根大学 xii (安·阿泊)和宾夕法尼亚大学。

在学术思想上,我要特别感谢对我的全部手稿提供了建设性反馈的三

位读者：狄忠蒲（Bruce Dickson）、欧博文（Kevin O'Brien）和苏黛瑞（Dorothy Solinger）；确实，他们的学术成就甚至在我动手此项目之前就影响了我在该课题上的思想。马克·布赖思（Mark Blyth）和大卫·布克哈特（Davis Bookhart）特别精心、任劳任怨地阅读了某些章节的多重版本。康乃尔大学出版社的坎代斯·阿肯思（Candace Akins）熟练内行地指导了此书的制作，罗杰·海顿（Roger Haydon）高超的编辑技艺、自始至终的关注和友谊值得我深深感谢。

上述人士均不对本书最后的成果、尚存的谬误、不合实际的论点或其他令人尴尬的缺陷承担任何责任。

尤其是，我感激所有企业家和其他受访者那无法回报的慷慨大方，他们是匿名的英雄，在文中以他名代之。没有他们，我将难为无米之炊。与此同时，大多数的采访在本书中甚至未被提及——就像摄影师拍了无数卷胶照片去捕捉一幅特别的影像。我在进行全国普查和广泛的田野调查时，从极为繁忙的人们那里搜集到的材料，仅有一小部分呈献于本书。

最后，我很幸运拥有一个绝对信任并支持我及我的研究的家。我的父母，特别是妈妈卡塞琳，我的妹妹林达，我的公婆贝蒂和萨姆，还有我的丈夫大卫，都以默默而又不可或缺的方式帮助了我——谢谢你们！我的两个儿子也给予了我间接的帮助：他们的降生（在写作过程的开始和结束之时）有助于使一切都按部就班。我怀着爱把此书献给他们。没有他们，我可能依然在重写导言，或游荡在中国尘土飞扬的市场上，记录着其他人的生活详情，而不是享受着自己的时光。

蔡欣怡

于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

# 目 录

|                          |    |
|--------------------------|----|
| 序 言                      | 1  |
| 第一章 中国民主资本家的神话           | 1  |
| 神话                       | 1  |
| 神话背后的现实                  | 2  |
| 中国经验的更广泛含义               | 5  |
| 中国的私营企业主                 | 9  |
| 研究与逻辑                    | 11 |
| 向前推进                     | 12 |
| 第二章 绕过民主:政权稳定、非正式制度及政治变革 | 17 |
| 民主期待的来源                  | 19 |
| 解释变革中的政权稳定性              | 25 |
| 第三章 中国私营经济的非正规及正规的复活     | 42 |
| 毛时代的建设社会主义和消灭资本主义        | 43 |
| 改革时代私营经济发展的悖论            | 45 |
| 第四章 私营企业主的认同感、利益和价值观     | 69 |
| 私营企业主五花八门的背景             | 70 |
| 企业家的感知和利益                | 76 |

|                          |     |
|--------------------------|-----|
| 企业家的政治价值观和期望             | 84  |
| <b>第五章 私营企业主应对策略的多样性</b> | 101 |
| 私营企业家“政治”策略的类型学          | 102 |
| 对私营企业家政治策略的分析            | 134 |
| <b>第六章 私营经济形势下的地方差异</b>  | 142 |
| 发展的地方“模式”                | 144 |
| 地方现实、应对策略和适应性非正式制度上的差别   | 155 |
| <b>第七章 改变中国:适应性非正式制度</b> | 189 |
| 没有政权变革的政治变革              | 192 |
| 适应性非正式制度                 | 195 |
| 比较的关联                    | 203 |
| 民主化的非正式根源?               | 206 |
| <b>附 录 研究方法论</b>         | 210 |
| <b>参考文献</b>              | 216 |
| <b>索 引</b>               | 238 |

# 第一章 中国民主资本家的神话

1

中国最大的问题是腐败和缺少法制。但是民主也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因为中国人太无知,没法参与政治。

——上海的个体户,2005年

## 神话

即使在1989年过去十年之后,阿德尔曼(Jonathan Adelman)仍然大胆地断言,“对于绝大部分没有到过中国而又密切关注中国的美国人来说,他们很难意识到中国正处在一个朝向资本主义和最终民主的历史性转折当中。”(Adelman 2001, 41A)<sup>1</sup> 国际商业社会也迅速添加上了它心满意足的预言,认为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将确保中国的民主转型。美国竞争力协会(American Society for Competitiveness)对其全体成员给出指导,“全球企业家必须不断地投资于公共基础建设,以保障那里的稳定、成功,以及充分民主的实现”(Global Competitiveness, January 2002, S183)。有一些政治学者更为乐观,他们宣称民主化在中国不可避免,并将因其经济增长而得到实现。戴蒙德(Larry Diamond 1999)强调说:“经济的发展迟早会给中国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和可能性),使其明确地转向民主政体。”<sup>2</sup> 胡少华在《中国民主化之阐释》<sup>2</sup> (Explaining Chinese Democratization, 2000)中阐述了这种一般逻辑:



中国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在可见的将来，中国经济将持续增长。不断增长的经济会带来更高的生活标准、更高的教育水平，以及更加复杂的社会经济结构。在这种情况下，会有更多的人提出更多的自由和民主要求。(155)<sup>3</sup>

还有一些学者致力于界定中国实现政治转型的经济基准。斯坦福经济学家罗文(Henry Rowen)预计，如果能保持5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率，那么到2015年，中国就会达到人均GDP7000—8000美元并且实现民主化(Rowen 1996, 61, 68—69)。<sup>4</sup> 罗拉(Xia Li Lollar 1997)不仅找到证据证明3 “市场经济与民主之间的正相关”，而且声称中国已经迈出了转向民主的两步走，因此“中国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的转变，即从极权主义向威权主义的转变，现在正处在开始一个更长期的迈向民主的第二阶段的边沿”(83—84)。温汉南(Tatu Vanhanen 2003)采用资源分布指数，认为中国已经达到了民主化的“转型水平”。

在一定程度上，这样的预言是受到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私营经济令人瞩目的发展的鼓舞。中国到1977年都还没有关于私营经济的官方统计数据，因为当时那还是非法的，在数量上是完全可以忽略的。而到2005年，个体商人达到了2930万，他们雇用着超过2亿的人口，达到GDP的49.7%（《中国日报》，2005年12月14日）。<sup>5</sup> 不过，私人财产一直都没有得到法律的保护，私营企业家(个体户)很难得到最常规的信贷资源，商人们也没有机会选举能够维护他们物质利益的政治领导人。于是，基于少数西方国家的民主发展经历，很多人期待中国不断增多的资产者队伍将自然而然地鼓动起富有“无代表，不缴税”精神的民主。他们会有策略地利用他们的经济资源来获取政治资源。如郑永年所言，“中国商人阶层有可能发挥他们的欧洲先行者当年的作用。资本主义正在催生中国的中产阶级，一个带着牙齿的阶级。”(Zheng 2004, 311)

## 神话背后的现实

私营企业主在1989后的政治风波中的形象已经过时，也容易产生误